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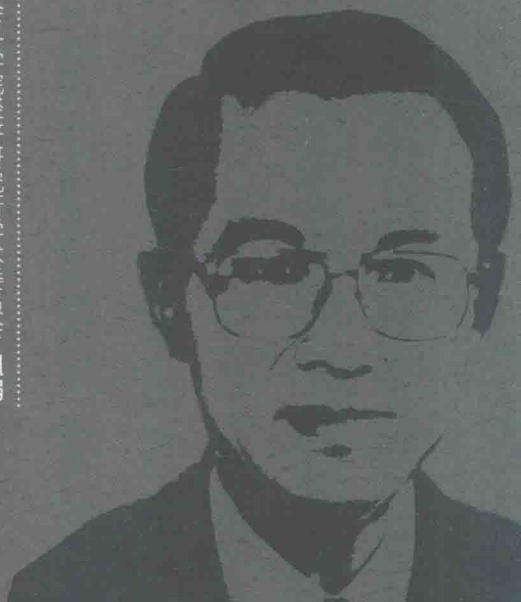


中国社会科学院
经济研究所
INSTITUTE OF ECONOMICS

经济所人文库

于祖尧集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 组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院
经济研究所
Economic Research Institute

经济所人文库

于祖尧集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 组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于祖尧集/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组编.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9. 1

(经济所人文库)

ISBN 978 - 7 - 5203 - 3495 - 2

I. ①于… II. ①中… III. ①经济学—文集

IV. ①F0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54386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刘晓红
责任校对 赵雪姣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9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2.25
字 数 300 千字
定 价 9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学术委员会

主 任 高培勇

委 员 (按姓氏笔画排序)

龙登高	朱 玲	朱恒鹏	刘树成
刘霞辉	杨春学	张 平	张晓晶
陈彦斌	赵学军	胡乐明	胡家勇
徐建生	高培勇	常 欣	裴长洪
魏 众			

总 序

作为中国近代以来最早成立的国家级经济研究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历史，至少可上溯至1929年于北平组建的社会调查所。1934年，社会调查所与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合并，称社会科学研究所，所址分居南京、北平两地。1937年，随着抗战全面爆发，社会科学研究所辗转于广西桂林、四川李庄等地，抗战胜利后返回南京。1950年，社会科学研究所由中国科学院接收，更名为中国科学院社会研究所。1952年，所址迁往北京。1953年，更名为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简称“经济所”。1977年，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之初的14家研究单位之一，更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仍沿用“经济所”简称。

从1929年算起，迄今经济所已经走过了90年的风雨历程，先后跨越了中央研究院、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三个发展时期。经过90年的探索和实践，今天的经济所，已经发展成为以重大经济理论和现实问题为主攻方向、以“两学—两史”（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和经济史、经济思想史）为主要研究领域的综合性经济学研究机构。

90年来，我们一直最为看重并引为自豪的一点是，几代经济所人孜孜以求、薪火相传，在国家经济建设和经济理论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的同时，也涌现出一大批富有重要影响力的著名学者。他们始终坚持为人民做学问的坚定立场，始终坚持求真务实、脚踏实地的优良学风，始终坚持慎独自励、言必有据的学术品格。他们是经济所人的突出代表，他们的学术成就和治学经验是经济所最宝



贵的财富。

抚今怀昔，述往思来，在经济所迎来建所 90 周年之际，我们编选出版《经济所人文库》（以下简称《文库》），既是对历代经济所人的纪念和致敬，也是对当代经济所人的鞭策和勉励。

《文库》的编选，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负总责，在多方征求意见、反复讨论的基础上，最终确定入选作者和编选方案。

《文库》第一辑凡 40 种，所选作者包括历史上的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历任经济所所长以及其他学界公认的学术泰斗和资深学者。在坚持学术标准的前提下，同时考虑他们与经济所的关联。入选作者中的绝大部分，都在经济所度过了其学术生涯最重要的阶段。

《文库》所选文章，皆为入选作者最具代表性的论著。选文以论文为主，适当兼顾个人专著中的重要篇章。选文尽量侧重作者在经济所工作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对于少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已成名的学者，以及调离经济所后又有大量论著发表的学者，选择范围适度放宽。为好中选优，每部文集控制在 30 万字以内。此外，考虑到编选体例的统一和阅读的便利，所选文章皆为中文著述，未收入以外文发表的作品。

《文库》每部文集的编选者，大部分为经济所各学科领域的中青年学者，其中很多都是作者的学生或再传弟子，也有部分系作者本人。这样的安排，有助于确保所选文章更准确地体现作者的理论贡献和学术观点。对编选者而言，这既是一次重温经济所所史、领略前辈学人风范的宝贵机会，也是激励自己踵武先贤、在学术研究道路上砥砺前行的强大动力。

《文库》选文涉及多个历史时期，时间跨度较大，因而立意、观点、视野等难免具有时代烙印和历史局限性。以现在的眼光来看，某些文章的理论观点或许已经过时，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或许



已经陈旧，但为尊重作者、尊重历史起见，选入《文库》时仍保持原貌而未加改动。

《文库》的编选工作还将继续。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还会将更多经济所人的优秀成果呈现给读者。

尽管我们为《文库》的编选付出了巨大努力，但由于时间紧迫，工作量浩繁，加之编选者个人的学术旨趣、偏好各不相同，《文库》在选文取舍上难免存在不妥之处，敬祈读者见谅。

入选《文库》的作者，有不少都曾出版过个人文集、选集甚至全集，这为我们此次编选提供了重要的选文来源和参考资料。《文库》能够顺利出版，离不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领导和编辑人员的鼎力襄助。在此一并致谢！

一部经济所史，就是一部经济所人以自己的研究成果报效祖国和人民的历史，也是一部中国经济学人和中国经济学成长与发展历史的缩影。《文库》标示着经济所90年来曾经达到的学术高度。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才能看得更远，走得更稳。借此机会，希望每一位经济所人在感受经济所90年荣光的同时，将《文库》作为继续前行的新起点和铺路石，为新时代的中国经济建设和中国经济学发展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是为序。

于2019年元月

编者说明

《经济所人文库》所选文章时间跨度较大，其间，由于我国的语言文字发展变化较大，致使不同历史时期作者发表的文章，在语言文字规范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为了尽可能地保持作者个人的语言习惯、尊重历史，因此有必要声明以下几点编辑原则：

一、除对明显的错别字加以改正外，异形字、通假字等尽量保持原貌。

二、引文与原文不完全相符者，保持作者引文原貌。

三、原文引用的参考文献版本、年份等不详者，除能够明确考证的版本、年份予以补全外，其他文献保持原貌。

四、对外文译名与今译名不同者，保持原文用法。

五、对原文中数据可能有误的，除明显的错误且能够考证或重新计算者予以改正外，一律保持原貌。

六、对个别文字因原书刊印刷原因，无法辨认者，以方围号□表示。

作者小传

于祖尧，男，1933年1月生于安徽天长，1978年进入经济所工作。

于祖尧出身于祖孙三代共产党人世家，祖父大革命时期参加革命，亲属中有6人为人民事业献身。于祖尧幼年投身革命，随军转战南北，先后在新四军淮南公学、淮南抗敌文工团、新安旅行团、华中干部子弟学校等单位从事宣教工作。1951年被保送入中国人民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学，师从宋涛、苏星等著名学者。由于学习成绩优秀，吴玉章校长两次授予他“模范学生”称号，并予嘉奖。毕业后调入北京外国语学院从事政治经济学教学工作。1978年，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1979年，于祖尧发表了《试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文，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范畴，主张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该文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一届优秀科研成果奖。调入经济所以来，先后任研究室副主任、所学术秘书、副所长、所党委书记、副研究员、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曾任第九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委员、北京市经济学总会副会长。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200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成立，于祖尧当选为首届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

在经济所工作期间，于祖尧先后发表《试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中国市场化改革：摆脱了困惑之后的艰难之路》《转型时期暴富群体的政治经济学分析》等300余篇

论文，出版《于祖尧文集》《中国经济转型时期个人收入分配研究》《忧思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理念到实践的跨越》等论著多部。

伴随着40年我国改革和发展实践历程，于祖尧展开了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理论问题的坚定而持续不断地探索。于祖尧的主要学术成果与学术观点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首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完整论证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观”；针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中的财富分配与价值取向问题，提出了维护民众利益的“公平分配观”；坚定地批判了西方新自由主义思潮；强调经济研究要重视历史研究、彻底批判历史虚无主义的观点。

1979年，于祖尧发表论文《试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率先提出并全面系统论证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范畴，并进而探讨研究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货币、市场及其相关问题。这是于祖尧最重要的学术成果。此后，作者还撰写了《论商品经济一般的基本规定》《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等文章，进一步阐发了社会主义中国应当实行市场经济的基本观点。

21世纪以来，于祖尧陆续发表《西方市场原教旨主义衰败和中国信徒的堕落》等一系列论著，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严厉批判了西方新自由主义思潮。于祖尧认为，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不单纯是超阶级的学说，已成为西方国家统治集团维护垄断资产阶级利益，对外推行新殖民主义、实行经济扩张、策动和平演变的政策工具，需要引起高度关注。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认识和分析必须有历史的观点。从全球经济思潮的实质作用看，“华盛顿共识”的形成标志着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已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从目前国内经济学思想变化看，忽视对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本质分析，盲目颂扬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动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已成为关系中国改革前途的重大问题。于祖尧的研究也充分细致地阐述了重视历史研究、彻底批判历史虚无主义的观点。于祖尧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对历史研究的重视构成了“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观”的重要内容。

于祖尧对改革过程中可能产生和已经出现的问题和矛盾给予了较多的关注。20世纪90年代初,在明确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后,随着财富和收入分配的日益不均,改革中各阶层利益分配格局渐次演变,利益冲突明显加剧,改革中的财富分配及改革政策的价值取向等问题,成为理论界争论的焦点。于祖尧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相继发表了《中国市场化改革:摆脱了困惑之后的艰难之路》《我国体制转型时期“农村病”及其治理》《我国当前收入分配问题研究》《转型时期暴富群体的政治经济学分析》等系列文章,针对这些关系改革前途的重大问题,发表了一系列引人瞩目的重要观点,提出了具有民本主义、维护民众利益的“公平分配观”。21世纪以来,于祖尧又陆续发表《中国经济内忧》《求解难题:我国经济内忧之成因》等文章,剖析我国社会经济中深层次的隐患忧患。

目 录

试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1
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	28
经济市场化和市场现代化是当代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趋势	
——谈我国发展市场经济过程中的若干问题	43
中国市场化改革:摆脱了困惑之后的艰难道路	53
我国市场体系发育和建设的历史进程	69
我国体制转型时期“农村病”及其治理	114
我国当前收入分配问题研究	129
转型时期暴富群体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144
遭遇“休克”劫难的俄罗斯经济	
——访问俄罗斯见闻	161
中国经济的内忧	176
求解难题:中国经济忧患之成因	199
走出“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困境,出路何在?	226
政治经济学研究 50 年	245
理论经济学在中国改革中的命运	286
西方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衰败和中国信徒的堕落	293
13 亿人民的消费需求:发展取之不竭的“金矿”	
——访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于祖尧研究员	312
我的土生土长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	
——我是怎样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	331
编选者手记	339

试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市场是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产物。市场的作用和范围取决于社会分工和生产专业化发展的程度。商品生产是为市场需要进行的。商品交换是通过市场进行的。市场是联系生产和消费的桥梁，是联系产供销的纽带。价值规律对商品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调节作用是通过市场机制实现的。列宁指出：商品生产，也就是通过市场而彼此联系起来的单独生产者的生产。所谓市场经济，广义地说，实质上就是与自然经济相对而言的发达的商品经济。

社会主义既然实行商品制度，那么，社会主义经济在本质上就不能不是一种特殊的市场经济，只不过它的性质和特征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原则的区别。

当前，我国已进入了以实现四个现代化为中心的历史转折时期。我们在调整国民经济的同时，正在着手从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方面进行一场深刻的经济改革。为了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搞好经济改革，应当怎样正确地对待市场经济，这是我们经济学界需要认真研究的重大课题。

列宁给我们的启示

1917年十月革命后，俄国无产阶级在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

* 本文提交于1979年4月在无锡市召开的关于价值规律作用问题讨论会，编入会议文集《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

克党的领导下，用不到半年的时间，粉碎了国内敌人的武装反抗，同德国签订了和约，赢得了暂时的喘息时间。这时，列宁就发出了“现在我们应当管理俄国”的号召，指出：当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任务解决以后，随着剥夺剥夺者及镇压他们反抗的任务大体上和基本上解决，必然要把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经济制度的根本任务，提到首要地位；这个根本任务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但不久爆发了14国武装干涉，经济建设被迫中断。战争一直进行到1920年年底，终于以苏维埃俄国的胜利而结束。

战争刚刚结束，列宁就明确指出：经济任务、经济战线现在又作为最主要的任务和基本的战线提到我们面前来了。如果我们不能恢复我国的经济，那么我们就落在而且将来还要落在资本主义列强的后面，我们就会挨打。为了迅速恢复陷入崩溃的国民经济，巩固无产阶级同农民的联盟，俄共（布）党适时地调整了党的经济政策，在全国范围进行了经济改革，从战时共产主义转入新经济政策。

新经济政策的主要标志，是用粮食税代替余粮征集制。国家用税收的形式向农民征收一部分粮食，税额比余粮征集制低。交纳粮食税之后的余粮完全归农民支配，允许农民在市场上自由买卖。根据1921年5月24日的指令，自由买卖的范围扩大到手工业品和家庭工业品。实行粮食税，就是允许在苏维埃国家和全民所有制的国营经济的领导和控制下一一定范围的自由贸易，开放粮食等自由市场。

利用商品货币关系改革国营经济的领导和管理体制，是新经济政策的又一重要内容。国家取消了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供给制，国营工业企业开始实行经济核算制。列宁指出：我们不应规避独立会计，……只有在这个独立会计的基础上，才能建立经济。各个托拉斯和企业建立在经济核算制基础上，正是为了要他们自己负责，而且是完全负责，使自己的企业不亏本。列宁认为，国营企业实行所谓经济核算，同新经济政策有着必然的和密切的联系，在最近的

将来, 这种形式即使不是唯一的, 也必定会是主要的。在容许和发展贸易自由的情况下, 这实际上等于国营企业在相当程度上实行商业原则。

此外, 苏维埃政权还颁布了租让制法令, 允许出租国营企业和组织合股公司。到 1921 年年底, 私人租借的小企业有 3874 个。1921 年到 1926 年, 同外国资本签订的租让合同有 135 个。

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和根据这个政策进行的经济改革, 很快就取得了预期的成果。一切经济命脉都牢牢地掌握在苏维埃政权手中, 公有经济得到了巩固和发展, 农业得到了迅速恢复, 城乡人民生活有了改善, 市场供应好转。1921—1925 年, 粮食产量增加了 77%, 粮食采购量 1925—1926 年比 1921—1922 年增长了 133%。棉花产量增长了 26 倍。甜菜增加了 20 倍。牲畜头数除马之外都超过了战前。苏维埃俄国的农业仅仅用 5 年的时间就走完了资本主义国家用 10 年时间走过的路程。工业总产值 1926 年比战前增长 8.1%。5 年内工业生产增长了 4.5 倍。零售商业流转额增长了 1.5 倍。在工业总产值中, 私营工业的比重由 4.3% 下降到 3.6%。1925 年农业中各种形式的初级合作社有 54813 个, 参加的农户占总农户的 28%。可以说, 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挽救了经济上陷入崩溃的苏维埃俄国。

当前, 我国所面临的任务, 我们所处的国际和国内条件, 我们准备进行的经济改革, 同当年俄国是不一样的。机械地类比, 或者照抄照搬, 是行不通的, 也是错误的。但是, 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对我们是有启发的, 新经济政策的原则和理论, 其中有许多东西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

历史赋予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拥有管理经济的特殊职能。但是, 国家管理经济不能单纯依靠行政办法、行政命令, 应当按照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 充分利用市场、价格等经济杠杆来管理经济。

列宁指出: 新经济政策是我们开始真正学习管理经济的一种形式。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列宁创立了

无产阶级可能在一国或少数国家首先取得政权的学说。但是，在十月革命前，由于没有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列宁在当时还不可能全面地、具体地提出在俄国这类国家中建成社会主义的完备理论。社会主义在一国胜利的学说，包括夺取政权的道路和如何建成社会主义两个方面。这后一方面只能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逐步解决。没有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就不可能认识社会主义经济规律。正是在新经济政策的实践过程中，列宁规划了在俄国这个经济文化落后，小农经济小生产占优势的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的蓝图，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许多光辉思想，在政治经济学宝库中增添了珍贵的财富。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是按照经济规律办事，用经济办法管理经济，特别是利用市场经济的光辉典范。

列宁曾经认为市场经济同社会主义是不相容的。他说：只要还存在着市场经济，只要还保持着货币权力和资本力量，世界上任何法律也无力消灭不平等和剥削。只有实行巨大的社会化的计划经济制度，同时把所有土地、工厂、工具的所有权转交给工人阶级，才可能消灭一切剥削。十月革命后，列宁曾设想直接用无产阶级国家的法令，按照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生产和产品的分配，把全体居民都组织到统一的消费公社网中，力求尽快地实行最激进的措施，准备消灭货币，取消贸易，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正如列宁所说的，当时根本没有提出我们的经济同市场、同商业有何种关系的问题。国内战争爆发后，迫于形势，苏维埃国家不得不按战时共产主义原则组织生产和分配，实行了以余粮征集制为主要内容的军事共产主义政策。大敌当前，这种政策是能够被农民所理解和接受的。但是，当战争结束，转入经济建设时，农民就不能容忍这种政策了。如果坚持过时的教条，不按照新情况决定党的政策，如果固执“长官意志”，坚持靠行政办法来管理经济，就不能挽救陷入崩溃的国民经济，就会导致工农联盟破裂。列宁指出：照顾到农民生活的特殊条件，向农民学习过渡到最好的制度的方法，决不可发号施令！这就是我们给自己定下的规则。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恢复国民经济必须从农业着手。在农业集体化的条件不成熟的时候，要发展农业生产绝不能无偿占有农民的劳动成果，而应当适应农民作为小商品生产者的特点，开放市场，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才能使农民从物质利益上关心提高劳动生产率，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列宁说：小农只要还是小农，他就必须有同他的经济基础，即小规模个体经济相适应的刺激，推动和鼓励。这里是不能离开地方周转自由的。实行粮食税，就是要在经济上承认和尊重农民对产品的所有权，使农民的物质利益得到保证，这样就能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活跃全国商品流转，改善城市供应，巩固工农联盟。

新经济政策的实质，就是在苏维埃国家掌握经济命脉的条件下，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发展城乡贸易，允许小农和私人资本从事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活动。商品经济的发展，要求加强各种经济杠杆在管理国民经济中的作用。俄共（布）十一次代表会议提出，从市场的存在出发并考虑市场的规律，掌握市场，通过有系统的、深思熟虑的、建立在对市场过程的精确估计之上的经济措施，来调节市场和货币流通。^① 列宁号召无产阶级国家必须成为一个谨慎、勤勉、能干的“商人”，成为一个精明的批发商。我们不需要那种旧的官僚主义的工作方法，我们需要考虑经商的条件，需要准确地了解商业的情况，善于很快地估计到一切变化。

新经济政策允许贸易自由，开放自由市场，让社会主义经济同小农、私人资本“在通过市场来满足千百万农民需要的基础上实行经济竞赛”。这样做，即使在当时俄国的条件下也并不可怕。列宁指出，从理论上说来，能不能在一定的程度上给小农恢复贸易自由、资本主义自由，而不至于因此破坏无产阶级政权的根基呢？能不能这样呢？能，因为问题只在于分寸。这种市场经济是在无产阶

^①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2分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37页。